

■高度 ■深度 ■力度 ■温度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的影

响是深刻的、长远的。邓小平主政西南局工作的这一段非凡历史，是我们重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遗产。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重庆日报

约请相关专家学者，围绕邓小平同志主政大西南的历史经验，撰写理论文章。现推出策划专版，以飨读者。

扎根大西南 过好胜利关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与镜鉴

□周廷勇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坚持严比宽好、精比粗好，发展和巩固西南党的组织，大力倡导宁“苦”不“垮”的工作作风，把克服一切享乐腐化思想、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贯穿始终，在发扬积极因素、战胜消极因素中，扎根大西南，过好胜利关。1950年2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会议总结时就“作风问题”强调，“依靠群众，艰苦朴素，反对享乐腐化”“我们在西南要扎根”“要稳稳当当地搞好工作”。他指出，我们的革命过了很多关，有困难关，有胜利关；防止腐化蜕变的“思想和行为来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这是我们要过的胜利关”“这个胜利关我们一定要过好”。

入城前后敲警钟，教育先行拧发条

进军大西南，坚持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先行。邓小平充分利用电文指示、干部扩大会议、报告会等形式，针对部队中存在的骄傲、怕走路、怕吃亏等不良倾向，抓好进军西南思想教育课。1949年，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怕走路”“不安心自身岗位的思想”提出批评：“现在是我们干部放下包袱向三野、四野学习艰苦朴素、遵守法律、顾全大局和友爱团结的时候了，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执行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光荣任务。”向进军西南途中部队发电文时强调，“不管房东在家与否，住宿后一定要打扫处理善后”“望深入教育各部严格群众纪律为要”。一系列的纪律教育，为“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进城后，压制一切腐化没落的思想。入城之初，部分干部存在“不愿驻乡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少数女同志“要从优待，要住阔气的地方”等享乐思想，西南局及时出手惩治争房子、争车子、争生活优待等苗头性问题。邓小平亲自担任机关用房清理委员会主任，对现有用房和用车情况进行摸底，并根据工作需要统一调整分配，对多占用的房子和汽车限期退出，逾期不退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在解决房子问题上，邓小平要求团以上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明令“必须依照中央取消私人公馆的指示加以检讨”。同时，他还责令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市政府机关尽快设法迁出“王宫”“渝舍”，将其建设成为对老百姓开放的枇杷山公园和重庆市少年宫。在解决争要车子问题上，邓小平针对非坐不行的“五里腿”问题，提出严厉批评。一套组合拳下来，很快刹住了乱占房屋和争要汽车的歪风。

建章立制重根本，定纪立规开先河

接管建政，千头万绪。入城伊始，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抓紧建立纪检监察机构来加强对干部作风的规范管理。1950年1月12日，西南局“遵照党中央指示，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使之实现其职务”。1月23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的人民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开始筹建。8月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监察工作要坚持立场和原则，抓住中心工作，防止官僚主义。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与正常运转，从组

织监督上为确保党员干部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纪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

在解决了纪律建设“有人来抓”的同时，西南局还积极探索“有规可抓”的问题。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将“内部工作秩序的建立”作为十一个部分的最后一条进行强调，要求“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鉴于开国建政之初，对于机关干部如何加强纪律约束缺少具体刚性规定。《党章》约束不了非党员，《共同纲领》关于干部纪律作风条款则又过于原则。为更好地监督和激励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严明纪律、服务人民，西南军政委员会结合西南区实际情况，于1950年11月通过了《西南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条例共11条，对奖惩条件、奖惩办法、奖惩程序等作了统一规定，使奖惩行为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西南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的订立，是西南区纪律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树立了忠诚担当、勤政务实、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干部标准，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区党的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干部队伍纪律建设和西南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砥节励行强示范，以案为戒聚正气

邓小平带头执行党中央的相关制度和纪律规矩。在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上，他不但严格要求下级党委和领导机关“除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外，市委和重要的企业党委必须每两月向省委、区党委和中央局同时汇报综合情况”，并自己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向中央及时汇报工作贯穿了他主政西南的始终。他向中央的报告包括加强纪律建设在内的报告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在对待老家亲戚找工作的问题上，他要求“组织上要进行政审，共产党的工作不白给”，绝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对待家庭参与土地改革问题上，他强调按政策办事，不搞特殊照顾，一切家产全部交给农民。在他的指示下，邓小平旧居搬进了9户农民，其中两间正房被用作村办公室。

抓住典型案例教育党员和干部。邓小平对进城后不少干部闹婚姻“改组”等不良现象，除及时加强思想教育外，还及时利用“妻子骂冤家长女婿”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举行公开判处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重婚犯罪案大会，西南局和重庆各级党政军机关代表近2000人参加，李民被判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庭审现场的面对面震慑教育，以及报纸对其持续深入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刹住了干部“婚姻改组”的邪风。这种透过个案发现“病灶”，又通过典型案例“治病”的方法，起到了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震慑作用和治本功效。

注重发挥《新华日报》在舆论监督中的重要作用。1951年《新华日报》刊登某小学化名“徐秀英”的来信，反映地方文教主管部门任意占用教师的时间，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报道引发重庆市第三区区长兼文教科长大同报社编辑部，通报社交出写信人真实姓名等极端事件，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对此，邓小平亲笔批示重庆市委书记和市长“干涉此事”。《新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位区长的“检讨书”以及对他和另两位干部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监督传递最强音。学校一度存在

的乱抽、乱调、乱占等混乱状况迅速得到了根本扭转。

集中教育抓整顿，“打虎”“划界”固成果

在党内开展集中教育，是增强党内团结、纠正党员错误思想的一条重要经验。1950年5月至9月，为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基础上前进一步，整风运动全面铺开。邓小平不仅亲自部署、全程指导，而且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在对象上，聚焦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尤其以县级以上干部为主；在内容上，既整改中央指出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还要求把西南区“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和“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在整风中加以克服；在方法上，从检查工作入手，学文件要少而精，主要是联系实际，启发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标准上，提出“四个是否”。经过整风运动，集中解决了“任务和政策的统一性和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些中心问题”，检查、纠正和处理了一些党员干部进城后滋生的贪图享受，争名誉、闹地位、闹待遇、闹离婚等错误思想倾向和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问题。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简节约、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西南局对此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西南地区的“三反”运动。经过“三反”运动，纠正了官僚主义，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还提拔了大批积极分子，工作效率提高了，到处出现了新的气象。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全面加强党的治本之策。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牢记“三个务必”，坚持自我革命，用好邓小平主政大西南、过好胜利关，着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一以贯之反对和惩治腐败，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把历史经验转化到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行动上。组织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系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主动找差距、定目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纪律规矩之弦，以严的纪律保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见行见效。

要把历史经验转化到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行动上。自觉从思想上追根溯源、挖根祛毒，从文化上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从机制上纠偏补缺、巩固提升。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坐大，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要把历史经验转化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的行动上。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为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全面推进清廉重庆建设，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供纪律保障。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罗振宇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围绕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了一系列谋划和探索，为西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产生，也为其继续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最终成熟提供了丰富养料。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经济思想，是被实践证明的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地区经济建设问题的重要经验总结。当前，重庆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此，要深入挖掘和研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把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立足实践内涵丰富

“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深刻阐明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指出，“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在农村积极推动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农村旧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后，邓小平又将注意力投向城市。在他看来，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必须把城市生产事业搞好，尤其是抓好生产管理。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企业改革等，激发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如土改、镇反、“五反”运动等，邓小平非常注意辩证地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既保证这些运动的正常推进，又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松，使西南地区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深刻阐明了经济建设的价值遵循。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党是依靠群众，工人阶级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明确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的执政理念。他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将整顿金融市场稳定物价和建设交通网作为两个重要抓手。邓小平指出：“如果不能稳定物价，我们就要脱离群众。”同时，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此外，邓小平还高度重视民生工作，一方面，积极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鼓励城市为农村服务；另一方面，要求“生活上、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于工人的‘小事’”。

“团结四个朋友”，深刻阐明了经济建设的力量源泉。邓小平指出，要搞好统一战线，才能建设好人民的新西南。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在部署农村经济工作时，邓小平非常注重领导和组织农民参与到一切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运动中。对于民族工商业者，他告诫干部，“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对于资产阶级，他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尤其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解决经济困难。诚如他在重庆市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就不可能设想在这一年四个月的时间里把局面稳定下来。”

“政府当然应尽力之所及，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己想办法”，深刻阐明了经济建设的主要手段。面对工商业发展的资金、原料短缺等困难，邓小平强调搞活企业要靠市场主体自身，注意调动市场的积极因素来恢复工商业，而政府也应在经济政策上下功夫。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他一方面要求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法令合理调整工商业，有计划、有组织地促进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工商业者遵循市场规律，依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方向和生产计划。同时，他还强调企业要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下功夫，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对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启示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有力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在处理各种经济问题时始终维护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特别注意“团结四个朋友”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是他依靠的重要力量。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新征程上，要进一步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协同创新发展，引导民营经济践行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除了善用政府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外，也注重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政府作用和职能边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弥补市场失灵，解决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邓小平在西南开创性工作的理论结晶

——重读《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反复告诫各级干部：“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因此，邓小平与刘伯承进驻重庆40多天后，西南局就作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重大决策，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的执政理念，是把“为人民服务”这个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立党理念，在夺取政权后转化为执政理念的理论与实践。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驻重庆以后，邓小平强调，“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得好”。而城市建设首要的是经济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在城市工作中始终把重点放在西南首府重庆的发展上。他亲自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全面统筹西南经济工作。一年后他便提出了城市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此中心工作的服务”。他给刚刚创刊的《重庆日报》题词“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他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强调，中心就是团结起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定要坚持按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根本方针办。随后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

为长期执政构筑坚实的政治基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党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依法执政。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政协的《共同纲领》是与中共的最低纲领相符合的，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如果共产党不执行，就是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就是违犯了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纲领发生任何怀疑或者阳奉阴违，都是不可许可的。”不管是老同志还是刚参加革命的新同志，都必须首先解决政治方向和

政治立场问题，提高理论修养。他说“我们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用这一思想武装全体党员，为提高执政水平奠定思想基础。

党必须始终如一地加强组织建设，培养大批具有执政能力的干部。邓小平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增加了党内无产阶级的比重；对西南地下党进行整顿，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在干部使用问题上不能只讲资历，而要坚持德才兼备，“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德、才两个字实际上是包括了‘资’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才能”。同时大力培育和提拔年轻干部。由于措施得力，西南地区很快就摆脱了党员和干部严重缺乏的局面，为后来全面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党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作风建设，树立执政党的良好形象。早在进军西南的途中，邓小平就对团以上干部敲响了警钟。他指出，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西南解放后，党内部分同志产生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思想；有些党员经不住进城的考验，发展到贪污腐化；有的对自己的婚姻闹着要“改组”。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非常重视，一再强调“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他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来教育广大党员，从最基本的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做起，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这些举措使得西南区党内的不良倾向得到了遏制和纠正，巩固了广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了执政党的良好形象。

邓小平在重庆开创西南新局所积累和创造的成功经验还很多，他多次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党从革命到执政的伟大转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重庆史研究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复兴文选》编纂出版”：192H002成果）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经济思想及启示

□周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邓小平同志在这里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邓小平同志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西南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科学分析执政环境，求实升华执政理念，不断探索执政途径，切实打牢执政基础，创新加强党的建设，开创了西南地区重整山河、稳定发展的崭新局面。

20年前，我组织并参与了《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文集收录了邓小平同志在此期间有关西南工作的文章、讲话、报告、电报、批示、书信、题词等。这是继《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出版后，邓小平个人的第三部著作。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西南局成立75周年之际，重读《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仍能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勃勃生机，对我们20年前的辛勤付出也倍感欣慰。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新局的理论结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对于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确立具有鲜明特点的执政理念

面对战乱初定，百废待兴的摊子，邓小平冷静地分析后指出，在经济上，西南物产丰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农副产品生产充足，商贸繁荣，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庆附近的重工业超过上海”，四川的工业生产在全国仅次于东北，居第二位。尽管国民党对西南经济实施了大破坏，但总的来说，“我们建设西南在经济上有优越条件”。在政治上，西南是“封建势力加上国民党十多年的法西斯统治基础”的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我们在思想上要准备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他还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够强”“地方工作同志，地下党同志，以及军队的同志，都得从头学起”。